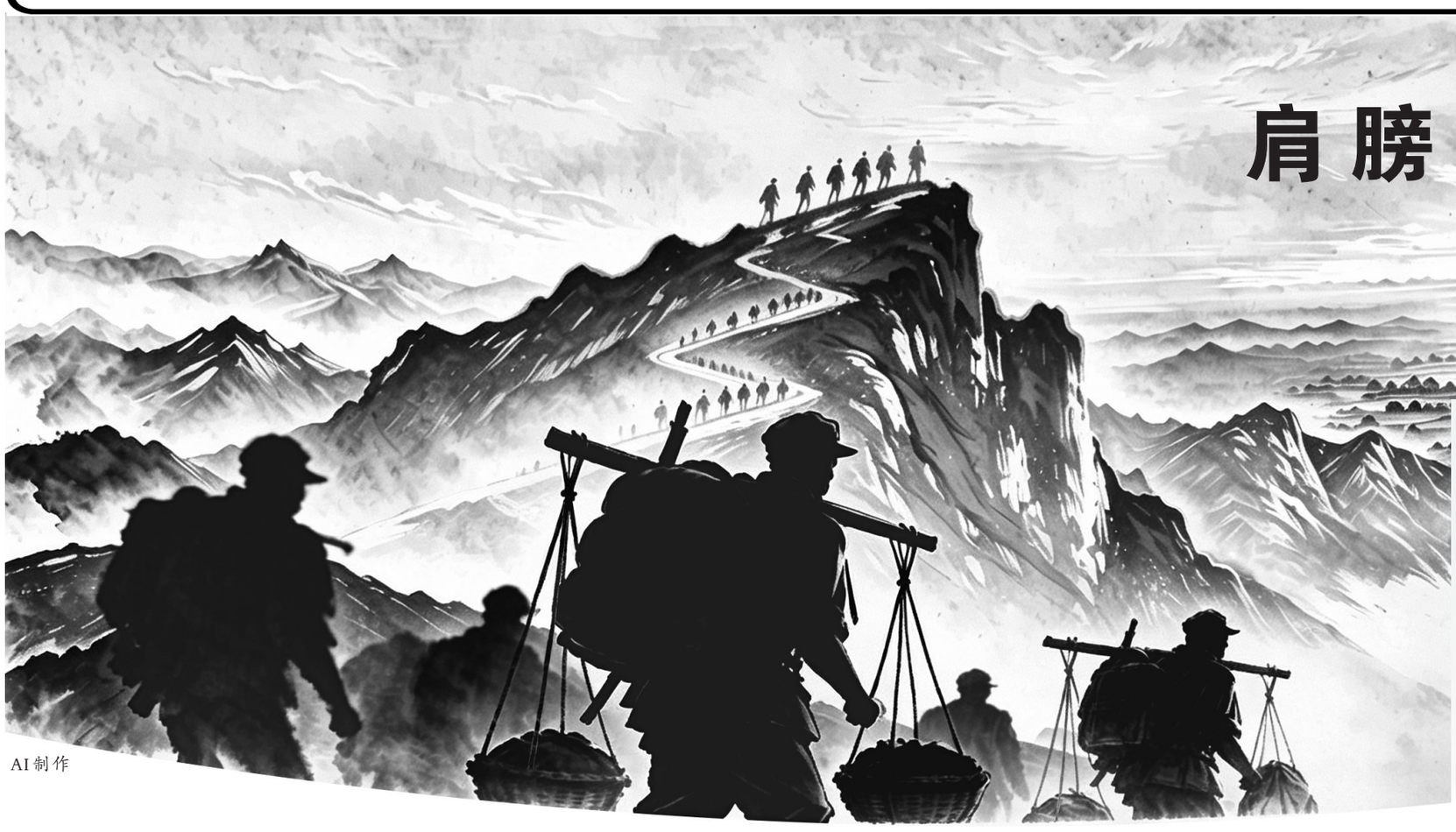
2026年11月5日 星期四
本版责编 陈 璐
电话:010-64294501 E-mail:whbfukan2025@163.com
中国文化报



AI制作

肩膀上的长征

卜 谷 王竹青

2026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江西，中央红军长征的集结出发地。当年，从赣南苏区出发的战士们，肩膀上不仅扛过枪炮，也扛过金银、药箱……扛起理想和担当，也扛起队伍的底气和民族的希望。

九秩流转，山河换新，老区巨变，初心不改。为什么那么多人怀着“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念，义无反顾地踏上那前途未卜的征程？为什么老百姓愿意倾其所有支持这支红色队伍？为什么长征精神能够代代相承、历久弥新？带着这些问题，笔者深入这片红色热土，采访多位长征老战士、红军后代和走在新时代长征路上的奋斗者。他们口中的长征故事历历如绘、令人动容，这片热土上的新气象生机澎湃、薪火长传。

扁担上的金库

世间的金库，多修筑于城池深处，由高墙守卫围护。可有一座红色金库，没有砖石围墙，没有铁门护卫，却更显固若金汤。它就扛在普通战士的肩头，在扁担上、背包里；它的围墙和护卫，是战士的信念与忠诚，是一支队伍铁的纪律。

我们的汽车在武夷山脉的盘山公路上绕了一圈又一圈，终于在赣南石城县横江镇张坑村停下。顺着林间小道往里走，跨过一座百年古桥，爬上层层梯田，几堵残墙在竹林中若隐若现……这里就是烂泥坑。一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秘密金库旧址”的文物标牌赫然在目。在风云激荡的革命战争年代，这里藏着我党的“家底”，为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提供了重要的经济支撑。

石城县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陈小毛介绍，1932年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瑞金成立。当时，中央苏区面临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为了巩固红色政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挥师东进，于1932年4月一举攻克闽南重镇漳州，缴获大量物资。考虑到这么多的金银物品存放在叶坪目标大、不安全，中央苏区决定设立秘密金库。1932年8月，经由毛泽民提议、毛泽东考察，最终确定烂泥坑为秘密金库建设地。

为什么选择烂泥坑？石城县横江镇张坑村党支部书记刘继周道破其缘由：此地位于大山深处，隐蔽性强；有古驿道，交通便利；离瑞金叶坪近，运送方便；且“烂泥坑”这个地名在周边有十几处，极具迷惑性。此外，群众基础好，“听我爷爷讲，当时村子里就住了二三十户人，有十几个都参加了红军。据说，当时不到7天，秘密金库便建成了。”

斗转星移，当年的山洞如今已被泥沙淤积，张坑村的秘密金库陈展馆为我们呈现了巧妙工事伪装下的藏宝地。黄金5担、银元和银元宝20担、珠宝3担、纸币2担，共30个挑担，麻布裹严，由战士分批分段、趁着夜色运进山坳，藏入地窖，堵死窖口，做好伪装。为了掩护秘密金库，国家银行还在金库上方设立了樟油加工厂，安排保卫人员扮成工人和商人长期驻守。这就是秘密金库。陈小毛说：“账册上写‘黄酒’‘白酒’，外人看了，还以为山里人在备席。其实，‘黄酒’是黄金，‘白酒’是白银。把家底藏进日常的词里，靠的不只是聪明，更是人人守得住的纪律。”

长征前夕的一个夜晚，国家银行秘密金库的门开了，不断有小股队伍进出。进去的人空着箩筐、木箱，出来时脚步被压得很稳。村里照常冒着炊烟，谁也不多问一句。根据整编命令，国家银行和财政部被编为中央直属纵队第十五大队，负责把所有的财宝、红军票、印钞机、铸币机等打包带走。印钞机被拆解开，螺丝、铸铁构件、木机架，分门别类装进藤筐与木箱。就这样，一支史无前例的“扁担银行”在长征路上诞生，随着红军部队踏上漫漫征途。

山风掠过隘口，箱子在扁担上微微摇晃。挑担的人，不清楚终点在哪里，他们只感觉，木箱是那样的沉重。雪山寒风刺骨，木箱结起薄冰；草地阴雨连绵，油纸之外到处是泥泞，挑担的肩膀换了一批又一批。他们走在队伍中段，隐匿于连绵的人流，连押运的战士也不许随意开启箱盖。宿营的时候，必须集中放置，篝火外围，专门布设岗哨。

敌机突袭，木箱被炸烂，层层油纸的包裹中，淌出一片白花花的银元；散了架的箩筐，放射出金子的灿烂光芒。轰炸暴露了秘密，挑夫与警卫战士却更加尽心尽力。他们知道，银元要换粮食、药品和布匹，金条则是队伍留给前路的一点底气。

还有一大部分金条和银元，分给了各个部队，由红军战士背在身上。这笔钱不属于任何个人，而是属于整个红军，是一个可以随时分散使用、随时发挥作用的移动金库。红军战士吴吉清记得很清楚，自己当时分到30块银元。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极其困难的爬雪山、过草地环境下，吃草根、啃树皮，二万五千里长征走完，没有丢失和借用其中一块银元。有几块袁大头、几块龙字洋、几块苏区造，每块银元上哪里有点疤痕、哪里划有记号，都记得一清二楚。因为这30块银元是红军的资产，像我的生命一样重要。”

这30块银元，从瑞金背到长征路上，再从长征背到延安，最后交给延安国民经济部的“永丰栈”，回到了集体的账上。一路风霜，没有一块银元改换过主人。

药箱里的医院

在缺医少药的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在瑞金叶坪成立了中央红色医院和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前者在医治红军伤病员的同时，也免费为群众治病；后者则跟着红军走完了长征全程。

1933年初被选送到红军卫生学校学习的兴国红军战士曾广昌，就是其中的一员。他们是红军卫生学校第六期学生，学制一年。毕业时，正好赶上长征出发，考场换成了战场。200多名毕业生全部编入中央卫生部。2017年9月在吉安采访曾广昌时，已年过百岁的他动情地讲述了自己的戎马生涯。

老人回忆，那一天，战场上抬下的伤员里，有一位头部、胸腹部都被炸烂的战士。曾广昌看到那张脸，心一下子揪紧了。那是和自己一起参军的兴国老乡啊！曾广昌跪在他身边，一边手忙脚乱地抢救，一边一遍又一遍地用家乡话喊他的小名：“牛牯子，牛牯子，牛牯子——”他听到了，费力地睁眼看曾广昌，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来。一会儿，眼睛就闭上了。

湘江的水，被红军战士的血染红了，伤员一直在往下抬。看着熟悉的、不熟悉的面孔一批批倒下，在自己怀里、手上变得冰冷，曾广昌受不了了，跑去向干部团团长陈赓申请：“我要上前线，拿枪跟敌人拼命！”陈赓没有答应，他指着曾广昌身上的药箱说：“你的战场就在这里，你的武器不是枪，是医术。红军卫生学校把你们教出来，不是让你们拿枪去拼命，是让你们救人的。”

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后，部队减员严重，尤其是卫生人员。这批刚出炉的“学生兵”，手里的书本气还没散，就被紧急补充到一线战斗部队。曾广昌被任命为红一军团二师四团的卫生队队长。红四团是长征路上的尖刀团，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先锋。曾广昌很高兴，自己背上那个药箱，要真正派上用场了。

为掩护主力渡江，红四团奉命死守觉山渡口这个咽喉要道。敌人的飞机在天上轰炸，炸弹把山头都削平了；地面上，十几个团的敌军轮番进攻，漫山遍野都是红军伤员。血浸透了泥土，也染红了曾广昌的双眼。他带着卫生员在炮火中一处一处找，一个又一个地包扎、止血。曾广昌记得，那一夜，谁也没有合眼，手上一直是黏稠的温热，心里是不止的绞痛。

红军卫生学校第六期的同学，从瑞金出发时有60多个人。长征结束后，大家在延安有一次难得的聚会，曾广昌与几个同学围在一起叙旧，聊着聊着，开始数人。这个呢？“在某次阻击战中牺牲了。”那个呢？“过雪山倒下了。”再一个？“湘江以后就没见过。”数着数着数不下去了，所有人都沉默了。不知是谁先哭起来，几个人抱在一起痛哭失声。但是当年，没有一个人逃跑，连后退的都没有。

曾广昌的药箱早已走进历史。90多年后，在吉安新圩，我们又见到另一只沉甸甸的药箱，挎在陈桂平肩上。2026年6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两优一先”表彰对象中，一位右臂袖管空荡荡、左手捧着“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证书的中年男子格外引人注目。他就是陈桂平，江西吉安新圩镇新圩村卫生所的一名乡村医生。

村民喊他，他总是随叫随到。我们见他一面，却着实不易。从北京载誉归来的次日清晨5点，天还没透亮，他已挎上药箱去村民家了。回来后，又马不停蹄地接待前来的病人。尽管只有一只手，但是检查、开药、扎针等操作十分流畅，脚步也是风风火火。而这，只是他30年来十分平常的一天。

陈桂平生于1977年，3岁那年因一场火灾失去右臂。肢体的残疾曾让他有些自卑，但家乡这片红土地“托”住了他。陈桂平的大爷爷是红军烈士，陈桂平对先辈们奋斗的故事耳熟能详，离家5公里的“二七”会议旧址、渼陂毛泽东旧居，更是他从小爱去的地方。被革命鲜血染红的土地，是孕育坚强意志的沃土。

陈桂平初中毕业后，父亲卖掉一窝猪仔，凑了3000元学费，带着他去当地一家卫校报名。可学校拒绝了他们：一只手怎么打针？你还是回去吧。陈桂平没有放弃，打听到南昌有一家卫校愿意招收残疾学生，便前往学习。为了熟练打针技术，他买回针头和注射器，在自己身上练习。1996年取得行医资格证后，陈桂平回到家乡办起诊所，从最初不被村民认可，慢慢变成了大家口中随叫随到的“乡村120”。这称呼带点玩笑意味，却是30年里一点一点干出来的信任。30年来，他骑坏了16辆自行车，行程超过12万公里，接诊人次超过20万。“乡村医生就是要到村里头去。不管多远，只要老乡们需要，能到达的地方我都会去。”陈桂平顿了顿，又高兴地说，“不过，以前骑车20多公里给人看病的情况已经没有了，路修好了，大家都更方便了。”

如今，陈桂平所在的卫生所配上了24小时动态心电监测仪等设备，电脑还装上了“智医系统”，轻点屏幕就能连上区总医院的专家，远程会诊，让村民不再多跑腿。“得了奖，你是不是要被大医院挖走了？”一位村民打趣地问。“放心吧，只要你们需要，我会一直在这里。”陈桂平说。



江西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内由草鞋组成的“草鞋墙”。 肖 靓 摄

草鞋上的深情

行军、打仗需要穿鞋，那时红军没有鞋厂，群众便成了最大的“草鞋厂”。在宁都、兴国、瑞金、于都以及原中央苏区其他地方的无数村庄，乡亲们曾挑灯赶制草鞋。瑞金的邱娣夫妇组织10多人编草鞋，3年编了几万双；闽赣水尾村跛脚的谢年昌，组织20多人组成草鞋队，10天赶制2000双……长征出发前，仅赣南苏区就赶制出20多万双草鞋。

草鞋穿在脚上，是肩头负重的支撑与基础。乡亲们挑回稻草，在灯下搓绳，托举起远征的脚步；扛着信仰前行的人，肩头的重量被草鞋稳稳撑住，漫漫长路，步履不停。

10月的于都县段屋乡寒信村，仿佛又回到了92年前那个出发的秋天。淡淡的稻草气弥漫整座古老的祠堂，一垛又一垛草鞋靠着土墙堆叠起来。今年已经82岁的肖南斗老人，边打草鞋边给游客讲述草鞋与长征的故事。他13岁跟着父亲学打草鞋，一打就是近70年。“父亲告诉我，红军刚来时，村里人觉得这些人‘真奇怪’——衣裳旧，脚板空，见着老乡却总要搭把手，给老乡挑水劈柴、修桥补路。大家看着看着，心就慢慢靠过去了。”肖南斗介绍，据说，1934年的那个秋天，邻里乡亲连夜赶工，短短数日，编出200多双草鞋送给出征的红军战士。

在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我们还看到了一双绣球草鞋。鞋身被岁月磨得发暗，鞋头却依旧萦绕着少女质朴的牵挂。它原是红军战士谢志坚长征前，青梅竹马的爱人春秀亲手为他做的。讲解员林春燕告诉我们，一路上，谢志坚把草鞋珍藏在背包里，只舍得穿过两次。可当1951年，谢志坚回到于都寻找春秀，才得知出征后不久，春秀就被敌人杀害了。谢志坚带着这双草鞋，伏在春秀墓上痛哭起来。

这双草鞋，也让人想起2017年采访过的老红军赖严秀。在赣南苏区，她参加的宁都黄陂妇女赤少队草鞋队，17个妹仔，个个是打草鞋的能手。“打草鞋有讲究：先搓麻绳，再理稻草。草要挑干净，不能带硬梗；稻草先泡水，再拿木槌捶软。编的时候，前鼻后跟分得清楚，草绳还得收紧……”采访时，已经97岁的老人家非要拿出一把稻草，给我们示范如何编草鞋。

草鞋是否合脚，脚最清楚。一天，一个战士专门回来找赖严秀。他说，行军的时候翻山过水，脚上的草鞋一直没有散。他把脚伸给赖严秀看，脚底全是厚厚的老茧。他说：“要不是这双鞋，我那回可能真掉队了。”打草鞋出了名，每天都有五六个战士特意来要赖严秀打的草鞋。赖严秀忙得抬不起头，只能笑着说：“莫催咧，手只有两只，打都打唔赢。”

赖严秀说，手工打草鞋快的一天可以打四五双。后来，草鞋队普遍用上了草鞋机，一个人一天可以打10到20双草鞋。整个草鞋队，一天可以打300多双草鞋。大家日夜赶工打草鞋，深夜天冷，手冻得发僵、磨到红肿，苏维埃干部就点起炭火，也加入打草鞋的行列。炭火一燃，祠堂里人气更旺。姊妹们一边搓绳，一边谈笑，困得眼皮打架时，便边打草鞋边唱《打草鞋歌》：“新打草鞋簇簇新哟，送给阿哥当红军。踏开蓬茸踏破雪呀，踏平世道妹欢欣……”采访中，赖严秀老人唱着唱着停住了，泪水顺着面颊往下淌……

红色基因代代相传，长征精神赋能发展。90多年前，从一双草鞋的一世牵挂，到20万双草鞋的鱼水情深，乡亲们虽没有走过雪山草地，却以另一种方式参加了长征。90多年后，从传统的制衣小作坊，到智能制造产业园，赣南儿女用为红军打草鞋、补衣服的双手，在一针一线中织出千亿元产业的时尚之都新图景。

今天，走进江西于都的卫棉纺织工厂，5G+慧纺云智能管控系统高效运转；赢家时装的智能车间里，工人们与数字化机器协同工作，产业温度与制造科技相得益彰……于都县纺织服装产业发展中心主任段先有介绍，于都有3850多家纺织服装企业，全县70万劳动力人口有30万从事纺织服装行业，80%以上规模以上纺织服装企业完成数字化改造。放眼赣州，当地更已形成以于都女装为核心，宁都童装、石城鞋服、瑞金织造、兴国牛仔为差异化的“一核四区”布局，全市纺织服装产业年营收突破1100亿元。

一双手，三代人，跨越90多年，这双草鞋的新长征仍在接续。

硝烟远去，银元载入史料，草鞋进了展柜，药箱还在村路上晃。长征留下的分量，至今还落在一副副肯替百姓担事的肩膀上。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秘密金库陈展馆。 受访者供图



张坑村。 受访者供图



2026年5月15日，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非遗草鞋编织传承人黄检英在编织草鞋。 肖 靓 摄